

王船山的一生，是“柳暗花明”的人生。虽然不乏悲愤，但更应慨当以歌。可以说，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华历史中所表现出的血性，有着王船山“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强大加持。近日，欧阳君山做客国学讲座，讲述——

王船山的大智慧和豪杰人格

■文/本报记者 许珂 图/本报记者 王翟



欧阳君山

参观过湘西草堂的市民都知道，王船山的故居里有一幅自题壁画，就是众所周知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王船山对自己一生经历与努力的自我总结，志在总结批判传统儒家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思路。近日，“注目礼学说”创始人、世界创客大会发起人欧阳君山做客国学讲座，为大家讲述王船山的大智慧和豪杰人格。

欧阳君山认为，对联的前一句是说自己致力于儒家的学术研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详尽的研读、评注和创新；后一句的意思是明朝亡了，七尺男儿岂能屈服。“从天”是指明朝的灭亡使自己心灰意冷，“乞活埋”就是说不怕清政府的压迫。整体两句就是表现自己的民族气节和人生追求。

“六经责我开生面”体现了王船山非凡的学术使命与成就

要说王船山的学问，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渊博，400余卷、800余万字，可谓皇皇巨著。从《船山全书》的内容看，包罗万象，于天人古今无所不涉，以至有论者称“王夫之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上集大哲学家与大文论家于一身的孤例”。

欧阳君山表示，“六经责我开生面”这一句则正好体现了王船山非凡的学术使命与成就，而其学问最鲜明的四大特征就是“一、正、实、达”。

王船山的学问具有“一”的特征，这里可称为一元论。这首先表现在王船山把世界归结为“气”，气是世界的一元本体，万物皆由气而“化”。同时，王船山的一元论更表现在弥合种种二元对立，从二到一，化

二归一。如，天理与人欲，王船山就明确表示“理寓于欲中”，“天理与人欲同行”，“终不离人而别为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又比如，权术与仁心，王船山也反复申明“术不在仁之外”，“有其心而术固具其中也”。

王船山学问给人的第二个印象应该是“正”。所谓“正”是“大本大源”，就是正派、正宗、正气、正大。“群经之首”的《易》被王船山当成了大本大源，不仅有“《易》者，天地固然之撰也”的明确说法，而且有“道盛而不可复加者，其惟《周易》乎”的深沉感慨，事实上也构成王船山心目中的正学之源。

“实”是王船山学问的深邃内涵，意思就是要有旗帜鲜明的唯物主义甚至实证主义。具体讲，有两个关键点彰显了王船山学问之高度务实，一者“依人建极”，一者实践理性。“依人建极”，就是理论不能够脱离人，而必须立足人、依靠人、为了人、服务于人、验于人，理论一旦脱离人，无论高大上，还是低劣俗，必流于虚妄，因为与人无关了；“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概念，意思是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纵观王船山的学问，真正高明之处应该主要表现为达。所谓达，就是通达，尤其指人情练达。在史论中，至少有三个方面能彰显王船山的知人晓事之达。首先，王船山强调坦荡平情，其以人论史，不仅把人的因素摆在第一位，更把人的政治成熟度尤其是“平情”作为人的因素的核心，这充分表现在王船山对所谓“大历史之道”的论述中，他通过论史对大臣之有的有名大臣作了个分类，包括清高之士、直谏之士、意气之士、功名之

士、刻核之士、矫诡之士、鄙陋之士，其实都是情商有欠缺的人；其次，王船山强调“大中至正”。他认为，不仅做人要大中至正，而且也是机权的根本；其三是审时度势，就是为人处世不仅讲实力、讲道理、讲正气，而且讲时机，即便理直气壮，甚至胜券在握，也不轻举妄动，而是待时而动，见机而作。

“七尺从天乞活埋”唱响了王船山的豪杰人格

王船山有部著作叫《俟解》，里面有一句名言——“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豪杰的人未必做得上圣贤，圣贤的人一定做得成豪杰。

首先，王船山有着拯救时代的恢宏志向。在修养上，他十分强调立志的作用，认为立志是人生的大本大源，所谓“志是大纲趣向底主宰”。他认为“志”是决定性的主宰，所谓“人品之大小不不齐无他，唯其志量而已”。王船山不仅有“故国魂犹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的不屈，而且有“千年欲识丈夫心，独上危峰揽苍翠”的高昂。

其次，王船山有着向死而生的壮烈情怀。王船山生于明万历年间，但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倾覆，崇祯皇帝煤山自缢，王船山闻讯后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在“反清复明”屡败而无望后，从此以明王朝遗民自居，并转而从文化入手，希望以著述讲学图文化复国，实现“用夏变夷”，对吾国吾民吾文化，情怀壮烈。实际上，在弃戎从文、隐居大罗山一带后，王船山已然向死而生，是“我自从天乞活埋”的“活死人”。

正因为王船山对吾国吾民吾文化向死而生的壮烈情怀，感天动地，成为中华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精神火种。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就明确称赞先生的风骨为“兴起中国人之种子”。

第三，王船山有着直取百世的献祭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王船山的理论自信，豪迈跨越时空，追求“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即是说，王船山在近四十年的隐居著述，不是为当时当世的注目礼，而是直取两百年后的“来世报”。

由此可见，王船山称得上圣贤学问与豪杰人格的高度统一。而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华历史中所表现出的血性，有着王船山“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强大加持。如，面对挥向维新者的屠刀，原本也可以东游他乡的谭嗣同毅然舍生取义，令人无法不联想到王船山的豪杰人格，他在狱中所题“我自横刀向天笑”形式上也极像王船山“我自从天乞活埋”。

船山学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色

天崩地裂的朝代剧变，铸就了王船山高尚而坚强的爱国人格，也激荡出其

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他一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期自许，为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历史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贡献，努力开创了古代哲学的新纪元。清初学者刘献延评价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

王船山的著作在清朝前期200年是“若存若没，湮塞不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由王船山六世孙王承佐交付邓显鹤校阅、邹汉勋编辑、刊刻《船山遗书》，并编撰了《船山遗书目录》，第一次把王船山提到与顾炎武、黄宗羲、李颀等明清之际哲学家相颉颃的地位，而船山之学开始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支军队会和一门学问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曾国藩统率的湘军例外。不但他本人手不释卷地研读船山学说，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求治国用兵之道。湘军的高层将领中也弥漫着浓郁的王学氛围，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金陵设局刻竣《船山遗书》，共收著作56种、322卷，船山学说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对近代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色。

湘籍著名经世派学者、中国首任驻外使郭嵩焘倡建岳麓书院船山祠。光绪四年（1878），衡阳县令张宪和为崇祀乡贤王船山，在王坪坪王氏宗祠始建船山书院，是中国最早以“船山”命名的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衡州知府樊世德根据彭玉麟生前遗愿，礼聘湘学泰斗、天下第一才子王闿运出任船山书院院长，很快使之成为晚清中国十大书院。梁启超指出：“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夫之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辛亥革命以后，刘人熙等在长沙曾国藩祠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产生了很大影响。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在此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称赞王船山“开一代风气之先”，“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的影响”。

如今，船山学说已经成了一门显学，不仅在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有研究船山学说的机构和专家学者，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都有船山论著、诗文译本，王船山的学术遗产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者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船山、费尔巴哈、马克思。美国著名学者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称王船山是湖南人的精神领袖。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称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

用典释义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

【讲话原文】

中国古人说：“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出处】

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颜色、出辞气效。无留善，无宿问。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

——（战国）荀况《荀子·大略》

【解读】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荀子主张知和行的统一，《荀子·大略》提出：“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意思是善于学习的人，能够透彻地认识事物的道理；善于实践的人，能够深入地探究事物的疑难。

《荀子》的首篇是《劝学》，他说“学不可以已”，认为学习是无止境的，并以此为喻：“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儒效》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认为学习是阶段与过程的统一，学习的过程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而学习到了实行也就达到了极点。

如何做到善学、善行？《荀子·大略》有具体描写：“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颜色、出辞气效。无留善，无宿问。”君子的学习就像蛇、蝉脱壳一样，很快就会有所改变。所以，他走路时学习，站立时学习，坐着时学习，脸上的表情、说话的口气都极力效仿。见到好事立即去做，有了疑难立即就问不过夜。

（据《学习时报》）

诗话衡阳



《江城子·在衡阳》

■李纲（南宋）

去年九日在衡阳，满林霜，俯潇湘。回雁峰头，依约雁南翔。遥想茱萸方遍插，唯少我，一枝香。

诗词赏析：去年的九月九日在衡阳，看到的是一派美景：“满林霜，俯潇湘。回雁峰头，依约雁南翔。”而现在呢，自己依然想念那里，感到不能够在衡阳把茱萸插上，实为憾事。作者李纲是福建邵武人，却对衡阳有深深的留恋之情。这说明，衡阳的山水、衡阳的人，在他心中一定很美很美。

国学热评



国学教育重在结合日常生活

■向春宇

近日，广东惠州市下角村民志愿者协会携手微笑爱心扶老助学会志愿者之家，开办的“孝悌传家少儿国学”公益读经班开班，免费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国学诵读课程。笔者留意到，这个国学班有别于其他国学班，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免费；二是既针对孩子，也针对家长；三是不只有诵读，还有理解和游戏环节。

近年来，以国学为主题的《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电视节目持续火爆，传统国学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国内不乏形式各异的国学班，但很多都只针对少儿，大多强调背诵或者诵读，并且大都是收费的。有的国学班在形式上做得很到位：孩子们穿汉服、盘头发、集体在操场上大声朗读，摇头晃脑有模有样。这种学习国学的形式，看似停留在表面，但很多孩子经过学习和诵读记得十分牢靠，能流利背出不少经典篇章。如果能让孩子进一步理解自己诵读的内容与日常生活的作用密切相关，将对其背诵和使用经典文段更有裨益。笔者认为，国学课堂既要注重形式，更要注重内容，强化孩子对诵读内容的理解；要让孩子既能背诵国学经典，又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家长应将国学教育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不断进步。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诵读国学经典，通过先诵读、后理解、最后做游戏来巩固理解；鼓励孩子完成国学班每天布置的功课，完成每日例行之事。这种学以致用，有故事有悬念有互动的教学方式，更能让孩子享受学习国学的乐趣。同时，家长也能在鼓励孩子的过程中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据人民网）

国学教育



《资治通鉴》为什么“号为难读”之书？

《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17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都对其精研细读，它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

《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17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司马光曾经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唯王胜之耳。”（《宋史卷286·王曙传》）。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都对其精研细读。

继《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

《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资治通鉴》序（宋神宗）御制），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全书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深研细读，评价其“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思，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二》）就是说：《资治通鉴》从前代社稷安危的经验教训中，看到忧患得失，由此来安排自己的行为以去危存安；从古人民情政事的利害得失中，替他们斟酌思量，以达到对当下兴利除害的目的。经验可以借鉴，教训也可以成为镜鉴，相似的可以借鉴，不同的也可以作为借鉴。所以治理可以借鉴的，就在于专注，而历史尤为值得珍视。

借鉴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知其所以然，还要进一步探究其何以不然。只有这样深入，才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历史读活。

礼治和德治是贯穿《资治通鉴》的重要思想

《资治通鉴》的真谛何在？换句话说，司马光通过《资治通鉴》最想传

达给后世为政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份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

《资治通鉴》全书共有218条史论。为了表明自己的历史见识，司马光不仅引用了前人的史论，而且自己亲自撰写了其中的119条“臣光曰”。《资治通鉴》的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调。司马光在第一篇“臣光曰”中指出，作天子的最大的职责就是维护礼的神圣性。而恪守礼的关键在于维护名分的合法性。“礼”就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分”维护的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名”则是安定政治秩序的关键。

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主要方式，事实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礼治的践行有赖于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匹配。为此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论。司马光认为“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容易看错人。由此司马光指出了一个让人沉重的历史现象：“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资治通鉴·周纪》）

乱世用人唯才是举，那是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而长治久安的用人策略还是要以德为先。所以治国治家者一定要仔细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权衡才与德之轻重，以防失去真正的人才。司马光指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周纪》）《资治通鉴》开篇所记载的三家分晋的历史背后，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以司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个貌似很极端的用人观：“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资治通鉴·周纪》）

总之，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贯穿《资治通鉴》中的重要思想。礼治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最高准则，德治理论是社会治理的执政纲领。

这可以说是司马光理想的治国蓝图，在《资治通鉴》的不同卷册中有多处大体相似的表述。历史证明，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有生命力的。《资治通鉴》所倡导的“立政以礼”和“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与为人为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鉴意义。（据新华网）